

图文精编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下)

国家图书馆 编



111
编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国家图书馆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目录

下 册

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399)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421)
任继愈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447)
张岂之	传统文化与优秀民族精神	(467)
刘梦溪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489)
刘海年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若干问题	(523)
阎崇年	读史·治国·修身	(551)
范 曾	走进国学	(571)
李中华	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	(587)
钱 逊	《论语》精要及其文化内涵	(605)
李学勤	清华简与先秦思想文化	(631)
刘家和	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641)
郭齐勇	《中庸》及其现代意义	(653)
颜炳罡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669)
杜维明	文明对话和儒学创新	(693)

杜维明	儒家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仁”的解析	(719)
陈鼓应	庄子的思想及其生活智慧	(735)
楼宇烈	魏晋玄学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749)
李存山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流变	(763)
刘 庆	《孙子兵法》 ——超越时空的军事理论经典	(791)
王邦维	“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 的交流与互动	(809)



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至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学科范围是中国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在甲骨学研究中，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青铜器研究中，强调“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因素综合研究，推动制订西周金文历谱，在分期上取得新成果。在战国文字研究中率先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五系说”，使这一学科分支趋于成立。在简帛研究中，参加整理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多种珍贵材料，并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有明显成绩和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共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专著20余部。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谈一下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问题想谈一下作为探寻中华文明第一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成果；第三个问题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探寻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

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有一句名言：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体会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属于自然史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属于人类史的研究，而人类史和自然史是连续的，是整个的宇宙一直到人类的发展过程。现在我们看起来，从宇宙的发展一直到人类的发展，有一系列的起源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科学上大家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问题。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之后，就是地球和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以及银河系的起源问题。在这个之后，还有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问题。在生命的起源问题之后，还有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人类的起源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说是和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一样，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从来为学术界所关注的。



银河系

什么是文明起源问题？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人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么样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之下，摆脱了自然的动物状态，怎么从自然的动物状态，或者我们叫做野蛮的状态，进入了人类的文明社会。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马克思到恩格斯都非常关注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曾经参考了当时有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说俄国的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美国的亨利·摩尔根的著作等等。大家知道亨利·摩尔根的名著就是《古代社会》，很早就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有不少学者研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参考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做过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有一部名著，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面，恩格斯专门讨论了从野蛮到文明的问题，而且从这个问题引导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后来列宁在他的《论国家》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恩格斯在他这部经典著作里面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他主要举了三方面的例子，第一个是古代的希腊，第二个是古代的罗马，第三个是古代的日耳曼。他根据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历史的研究，对比了当时一些人类学的研究，然后讨论了怎么样来看待从野蛮到文明这样一个重大变革的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

当时的欧洲，东方学和考古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很少提到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的，比如像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像古代的印度。他们完全没有提到古代中国，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到今天这个情况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只要谈到世界的古代历史，都是讲到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刚才说的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古代的印度，还有古代的中国。

我们中国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幅员最大，当时人口也最众多的一个。而且中国不但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还有一点是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以及与希腊、罗马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它是继续传流下来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是古代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非常遥远，今天的埃及与古代的埃及不管是在人种、还是在文化上都

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那几个古国，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等，这些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断绝了。就是希腊、罗马这样的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后来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文艺复兴，它们的文明都没有一直从古代传流到现在。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虽然中国的历史有这么多的风云变幻，有这么多的朝代改变，可是中国的文明是一直传流下来，一直传流到今天，这个应该说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正如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就是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今天的中国人口占到世界上的五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在古代世界里面，中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相对众多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因此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

如果把我国中国文明的起源忽略掉，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应该说有所欠缺，不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有助于有关文明起源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的探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正如各位所了解的，中国人，包括在世界上的华侨、华裔，都是以中国文明的历史悠久、它的绵延不绝、它的光辉灿烂而自豪的。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这么光辉的文明历史，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以及华侨、华裔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去科学地探究、说明、阐述中



甲骨文

华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过程，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谈到中国人都以中国的文明的历史悠久而自豪，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上人人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用另一句话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因为我们说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的文明从炎帝、黄帝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炎帝、黄帝那个时代距今，一般的理解就是

将近五千年。所以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和炎黄子孙这句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这是有根据的，有着古书上明确的依据。

我们中国的历史书，过去按传统的说法，有正史、别史、杂史、小史，各种各样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所以外国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传统叫做正史的，主要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



黄帝陵



位于陕西延安轩辕庙里的黄帝脚印石

一部，大家都知道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当然和世界上其他古代国家和民族的古史一样，带有很多的神话色彩，古代史书一定是这样的，可是里面也有很多今天看起来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文明的创造，所以现在每年祭黄帝陵，里面有一个匾，上面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这句话，就是说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传说记载，黄帝时期是我们文明的开始，或者发皇的时代。而黄帝的时间，



郭沫若

按中国史书上的传说来说就是5000年前左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推翻清朝的统治，不再用清朝皇帝的纪年了，就曾经用过黄帝的纪元。当时有不同的看法，有几种数字，一般都在4600多年或者4700多年，所以说黄帝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个是有史书依据的。当然有史书的依据并不能得到现在学术界的公认，因为史书的记载有一些是神话传说，有一些经过后人的篡改，不一定都那么样可靠。

那么究竟我们中国的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就不能只依靠历史上的文献记载，而要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学者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中国文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通过怎么样的途径起源的？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非常注意。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专门写出著作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在1929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被推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部专著，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提出来，说恩格斯所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可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中国。郭沫若同志写这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以恩格斯的著作作为向导，把恩格斯所没有讲到的中国补充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郭沫若同志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学者又在这方面做了探讨。

最近几十年，大家都知道随着我们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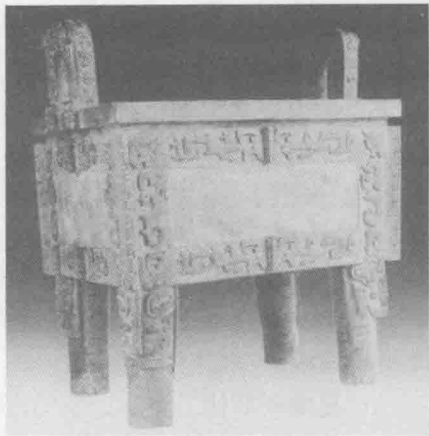
工作发展得特别迅速，有了一系列的、有些甚至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我们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我们早期的历史，已经有了过去所不具备的材料积累，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学科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在我们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有关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而且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件事，在2002年的4月11号曾经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题目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在这个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同志有一个开幕词，标题叫做《研究历史，指点未来》。他说研究和借鉴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界、知识界的责任，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宋健同志说：现在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清朝龚自珍讲过“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取其史”。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个著名学者，他提到要想把一个国家彻底毁灭，一定要去掉它的历史，这一点后来梁启超也多有发挥，所以宋健同志引他的话，说我们和后人应该小心，不要上当。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探索我们文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过程，这样对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会有重要意义。这是今天我向大家讲的第一点，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它的主要成果。刚才我们谈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它的起源和它的发展，新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国家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方面起步，做了一些工作，用新的方法，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去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几年以前已经开始做了，这就是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在1996年启动的大型科研项目，在它开始设立的时候论证的文件里面就规定了，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要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工程的目的是确定的，就是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做一个准备，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工程可以视为系统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起步。

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想这里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多学科交叉，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3个朝代的年代学问题。大家知道夏、商、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3个朝代，当然它的时间距离刚才说的5000年的黄帝时代还是比较远的，可是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繁荣、最发达的时代。研究它的年代学问题，就是要对这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和历史的研究给出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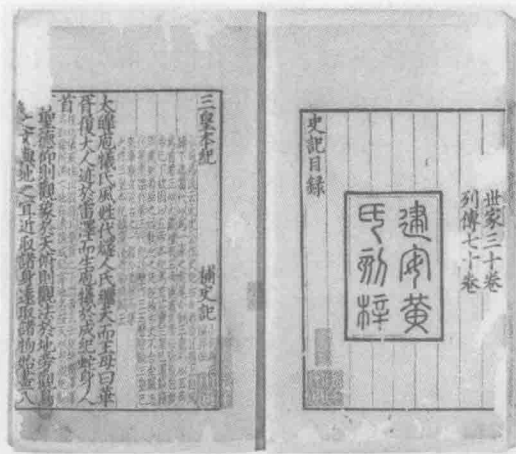
商朝司母戊鼎

一个时间上的尺度，就是说这些朝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给一个科学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1995年秋天开始提出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宋健同志，他邀请了在北京的一批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具有的一定的条件和优势，来支持一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当时各方面的学者汇报了有关学科所进行的情况和条件，最后宋健同志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先进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首先弄清楚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设立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1995年的年末，由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宋健同志，还有另一位国务委员，就是负责社会科学和文物考古方面的，今天在座的李铁映同志，共同组织召集了一个比较大的会议。这个会议有7个部委级的单位领导，包括当时的国家科委，今天的科技部，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国家教委，现在的教育部，还有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7个单位的领导参加这个会议，邀请有关学科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建立。这个项目被列为“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到1996年春天，经过反复研究和准备，组成了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提出可行性论证报告，最后在1996年5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的按照系统工程的原则组织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一共设立了9个课题，本来设立了36个专题，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又滚动增加了一批，最后一共是44个专题，9个课题44个专题。参加的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一共有约200人参加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之下，经过了5年的集体努力，9个课题44个专题陆续结题，达到了预期的目标。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组的验收。同年10月，由工程的专家组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到2000年的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夏商周断代工程”，它的内容就是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的年代。周实际指西周，东周的年代是清楚的，所以主要是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年代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过程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也不是现代提出来的，而是在古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确切年代，或者说年表，只能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的中叶。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从今年往上推，每一年都可以讲出中国以及国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整个的历史都可以一年年排出来。从今年来说，今年是2002年，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杯，昨天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回到了北京，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去年在国际上发生了“9·11”事件，前年又有什么，一年一年都可以

可以在历史上往上推。我们中国的历史，按这样往上推，可以推到什么时候？可以推到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样？原因就是我們刚才讲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人，他在当时编著的《史记》里面已经做了年表，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一年年排出来。他的最早的年表叫《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是选取了



《史记》

周以及一些重要的诸侯国，排成一个年表，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创造。他的年表不是从东周开始的，而是从西周晚期，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开始。大家知道在西周晚期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周厉王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对民众的剥削特别厉害，实行暴政，依靠着一批坏人，大肆收敛，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国人起义”，把他赶走了，把周厉王从当时他的首都，就是现在西安附近长安区，一直赶到山西去了。他被流放在那里，一直到死。这个时候周朝就没有王了，由两个大臣来执政，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由周召二公来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执政”。“共和”这个词后来就被借用来翻译republic这个词，共和国的共和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事件是有准确的纪年的，按公元来说，就是公元前841年。

司马迁为什么不往前编这个年表了呢？在他的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不是没有看到有关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而是看到很多种。他说他看到很多的书，这些书里面从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可是互相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觉得既然是有不同，他不能够选定哪一种说法，因此他就存而不论，就不编成年表。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很多是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的，他是西汉时候的人，很多他看到的東西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态度还是非常之好的。

有些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国人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只能确切地上溯到公元前841年，这在世界上是不是很落后的？并不是这样，其实各个古代国家基本都是一样的，它越早的历史就越模糊，是必然的现象。比如说古代埃及的历史，如果确切一年年往上推，按照历史书的记载，也只能推到公元前7、8世纪。希腊的历史也差不多。中国推到公元前841年，就是公元前9世纪的中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是这究竟不能满足研究历史的要求。因此在司马迁死后就有学者要来补充，来解决司马迁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做这个工作的是著名学者刘歆。刘歆是西汉末年的人，他不但是文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当时非常有成就的天文历算专家。刘歆是我们现在所知在司马迁之后第一个用当时新的方法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学者，他的结果都记录在《汉书》里。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就是周朝开始的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他的学说是有很广泛的影响的。可是不管是刘歆，还是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其他学者所做的许许多多的

工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什么原因呢？我想各位都可以了解，因为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书，一般说起来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只有失传，很难有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超过司马迁，要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就很难了。所以只凭古书来研究就不能够超过司马迁的记载。当然他们弄清了一些问题，这里就不详细来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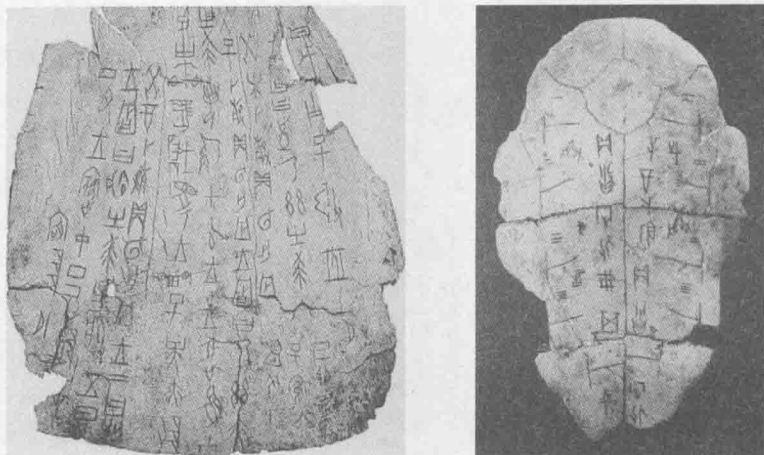
从清代晚期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有了较多的青铜器的铭文，即金文，情况有了不同，特别是1899年发现了殷墟的甲骨文，提供了古书里面所没有的新材料。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使人们对古代有了不同的认识途径，根据这些材料，又有很多的学者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问题，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很多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进步。可是他们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学者的公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了解，对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即使像年代学研究这样很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即使他在自己学科方面是最权威的、最前沿的，他仍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这些有关学科都能够占领、都能够掌握，这做不到。过去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年代学这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管

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般说起来，他们都是基本以自己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最多也是和他邻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进行交流参考，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研究。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留下来，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得到新的进步。

我们在筹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就特别体会到我们当前条件的特殊性，不但是近20多年以来，考古新发现积累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的新材料，而且我们有着社会主义的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有铭文长达291个字



甲骨文

优越条件，可以比较顺利地来组织多学科、大型的系统工程。这样我们就组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涉及的学科超过10个，主要有4个门类，一个是历史学，包括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一个是考古学，还有古文字学，就是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古代文字的考释研究。一个是天文学，包括古代历法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科技测年，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主要的是碳14年代测定，是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测定方法。这样就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各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究竟是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来研究？9个课题，44个专题，各自有具体的研究途径，如果一一介绍呢，那太繁琐，不太实际。请允许我用不很恰当的方法做一个比喻，使大家了解到我们基本上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大家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项目就像一个车间一样，有两条生产流水线，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古代的年代。大家知道我们要求的是用数字来表示年代，就是说得出的成果不管精确到什么程度，是要用公元前多少年来表示出来。我们说生产线可以生产出这些数字。有怎么样的两条生产线呢？

第一条生产线是关于文字记录。文字记录又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书里面有关年代的记载。中国的古书传世的特别多，里面有很丰富的记载，当然有不少我们现在可以采用的记录。对于这些文献记录，我们进行普遍搜集，建立了电脑资料库，从里面选择出有意义的一些材料